

当代名家随笔丛书



缕

何西来著

横坑思

羊城出版社





何西来著

横坑思

缕

群众出版社

(京)新登字 093 号

版式设计:刘兆田

横坑思继

何西来 著

群众出版社出版、发行 新华书店经销

湖南新华印刷一厂印刷

787×1092 毫米 32 开本 8.375 印张 132 千字 插页 4

1993 年 11 月第 1 版 1993 年 11 月第 1 次印刷

ISBN7-5014-1122-0/I·402 定价:5.90 元

印数:00001—21000 册



何西来

就情急火燎地向她扑过去，以滿足其私欲。作
为一个无權无勢的弱女子，她无力保护自己。
她只有一个住在贫民窟一样的小巷里的老母親，
還需要她供養。为什麼在这个世界上“站住脚”，
她不能一而再、再而三地“做她不想做的事”。
她忍受着精神的和肉体的凌辱，心里痛苦，
却还要装得像个正常人一样，强颜欢笑，眼泪只

小 传

何西来，本名何文轩，常用笔名飞丁、骊声、陈沙、邴来、安逊等。1938年3月28日生于陕西省临潼县秦皇陵东上何村，祖辈农耕为业，但稍有文化，母姓安氏。

五岁入村塾启蒙，曾先后就读于县城骊山小学，新丰鸿门小学。1949年夏，步行到省城西安，考入西安市二中。六年后入西北大学中文系，1958年毕业，留校任教一年。1959年入中国人民大学文学研究班，1963年毕业后调中国科学院文学研究所。曾任文学研究所副所长，《文学评论》副主编、主编，研究生院文学系主任，现为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研究员，中国作家协会会员。

主要著作有《探寻者的心踪》，《新时期文学思潮论》、《文艺大趋势》等。

自序

说实话，编完这本小书的时候，我的心情多少有点像这窗外的天色，阴沉沉，灰濛濛的，丝毫没有人们作完了一件或繁难，或得意的事情之后通常会有的那种轻松，更不要说像大人物们检视自己的文治武功，杀伐战绩时的那种不可一世的豪气了。这里所有的，不过是一己的小感触，小议论，小悲欢，尽管写它们的当时，多半是有所感而发，也曾思绪翻涌，甚至热血沸腾。

这些文字，是从近十多年来我所写的随笔中选出的，以九一、九二年为主，计三十七篇。它们的内容，涉及人、事、作品、思潮等诸多方面，既有理论的断想和感悟，也有技巧的评析与鉴赏，但基本上都与文艺问题有关。在写法上，它们因时、因地、因对象之不同，而不拘一格：有些篇什近乎散文，有些篇什很像短论，有些篇什则可见杂文的锋芒，还有很难归类

的。不过，似乎都可以冠以随笔的称谓，取其随时敏捷，随意放言，随兴所至，随意写来之义。当然，这些个“随”，都是在极其相对的意义说的。

我不常写随笔，以往只是偶尔为之；近两年才写得稍多些。因为不常写，故技艺欠圆熟，笔法欠老辣，意境少空灵，也就说不上有多高的审美价值。但更根本的却与自己长期从事研究工作，从事理论批评有关。职业性的挑剔，职业性的防范和职业性的主流框架，留给自由幻想、自由想象驰骋的心理空间，变得越来越狭窄了。由于自由的心理能力和心理空间的贫弱与退化，我的文章的缺乏情采，的理胜于文，就难以避免了。这很像是一种先天的缺憾。

但尽管如此，与我的那些板滞的长篇论文比，这些随笔毕竟较少禁忌，也不曾包裹厚厚的防护盔甲，因而也就更容易从中看出我的性气，我的为人，我的想事方式、情感方式，我的长处和短处。它们的价值既不在于有多么深刻的思想，更不在于有多么斐然的文采，而仅仅在于，面对着历史的风涛和文坛的艰难蜕变，曾经存在过这么一个真实的人，他曾这样真实地思考过，表达过。如此而已，岂有它哉！

对于世纪之交的中国文坛来说，这本小书是微末的，不足道的，像轻尘一样；但在作者，却是他生命

运行中不断蒸腾的情思，它们丝丝缕缕地牵绕着，飘流着，涌动着，不肯散去，像执着的怨鬼。于是我想，就用其中一篇文章的现成标题为这本小书命名罢：也叫《横坑思缕》。

1993. 4. 30.

目 录

自序	(1)
说“鉴”	(1)
陀螺和陀螺文艺	(11)
诗祸漫议 (一)	(16)
诗祸漫议 (二)	(23)
诗神缪司及其它	(28)
无技巧境界	(37)
打开思想的窗户	(44)
睁眼和闭眼	(52)
创作自由和独立思考	(58)
新时期文学中的反封建主义思潮	(61)
兼容种种	
——读《百家》创刊号有感	(68)
争鸣的规则和风度	(78)

“吃”的学问	(85)
“味”的美学	(90)
愚人节的感伤	(97)
双塔寺牡丹	
——晋行漫笔之一	(107)
天龙山纪游	
——晋行漫笔之二	(115)
并非和导游小姐过不去	
——晋行漫笔之三	(123)
红鲢鱼，红鲢鱼	
——晋行漫笔之四	(131)
锯齿上的情思	(142)
《草木篇》的沉浮	(148)
走出沉重的记忆	(152)
并非不必要的补遗	
——关于俞平伯先生的“书生气”和 “出生诗”	(162)
小亭沧桑	(169)
美，寓於偶然中	(174)
横坑思缕	(178)
世纪末的回顾与前瞻	
——关于文艺学的发展走向	(185)

批评家的人格与自戒·····	(190)
模式的建构与衰变·····	(194)
文学批评以文学化为好·····	(202)
命题的讲究·····	(208)
文学观念转变与阵地意识·····	(214)
诗心见师心·····	(219)
观念更新和多元意识·····	(224)
有本事，就去弄潮·····	(232)
人格，人格·····	(240)
关于春天的梦和希望·····	(249)
编者的话·····	(256)

说“鉴”

鉴，就是镜子。它有光滑平整的面，靠了光的反射作用，能够再现物体的形相，不溢美，也不藏丑。越是好的镜子，越能毫发毕现。镜之对人有用，原因盖出于此。

中国最早的鉴，大约是用青铜铸造、磨制而成，所以“鉴”字和“镜”字都从“金”。改用玻璃，则是很晚的事。但无论是青铜鉴，还是玻璃镜，那用途却是一样，无非是照物，照人。人之发明镜，恐怕主要是为了从中照见自己的尊容，以图有所改进，增其美而减其丑。于是，梳妆打扮，涂脂抹粉，画蛾眉，正衣冠，都离不了它。

因为镜子和人关系密切，所以常被用来作各种比喻。李白诗中有“小时不识月，呼作白玉盘；又疑瑶台镜，飞在青云端”的名句，是用镜的圆和明净，比喻满月的皎洁。过去官家的大堂上，常常挂着“明镜

高悬”的匾额，则是用镜的照物真切，比喻坐在匾额下的执法者的明察秋毫。这当然多是别人的谀词，或官员的自诩，和实际并不相干。“破镜重圆”的成语，撇开它的典故不讲，作为比喻，仅仅取镜的形制为圆这一点，和它能够照见物体的功能本身，已经没有什么关系了。

把历史当作镜子，这是古已有之的。“殷鉴不远，在夏后之世”，就典出《诗经·大雅·荡》。说明我们的祖先在两千多年以前就已经提出了以史为鉴。这篇《荡》，据毛传说：“召穆公伤周室大坏也。厉王无道，天下荡荡，无纲纪文章，故作是诗也。”周厉王是很有名的暴君，他曾用“监谤”的政策来钳制舆论，不许谈国是，不许议论朝政，更不许批评他本人，违者格杀勿论。当然，“论死”的时候，一定要先给扣上“谤王”的大帽子，然后典刑。王是只能呼“万岁”、称“圣明”的，“谤”还了得？但召穆公毕竟是很有政治经验的臣工，为了避免被扣上“谤王”的大帽子而脑袋搬家，他想出了“托古讽今”的办法，借文王的口指责殷人有法不依，政教失调，民怨沸腾；说夏的灭亡，本来是殷的一面镜子，殷不以夏亡为鉴，只好被连根拔起。这分明是“指着和尚骂秃驴”，但因为是托姬昌的口说的，厉王纵然凶暴，也不至于起他的老祖

宗于地下而鞭之。召穆公终于没有违反“温柔敦厚”的诗教，这是他的幸运，多亏那时的厉王以及他派出去“监谤”的巫们，还不懂得两千年之后的“影射攻击”都可以治罪，否则他的下场也不美妙。

然而，以史为鉴毕竟是召穆公的一大发明。他把一件有力的武器交到了后来一些英明的君主和能臣的手里。魏征是唐初一代名臣，刚直不阿，敢于犯颜直谏，忤逆龙鳞。他常常手里拿着历史的镜子，要唐太宗照。太宗是开国的英主，知人善任，从善如流，而且头脑清醒，是贞观之治的总设计师和总指挥。但即使象他这样的人，居于帝王之尊，待到龙椅坐稳以后，也常常经不住享乐的诱惑，而稍稍懈怠，政治上举措失当之处，行为上有失检点之时，所在多有。每当这种时候，魏征就以隋的覆亡为前鉴，高喊“载舟覆舟，所宜深慎”，要他“居安思危”。有一年李世民东幸洛阳，次昭仁宫，多所指责。魏征就当面给他提了意见，回来后又写了一封颇长的奏疏，分十条批评他的懈怠，并逐条与隋对照。其中有这样一段话：“夫监形之美恶，必就止水；监政之安危，必取亡国。诗曰：‘殷鉴不远，在夏后之世。’臣愿当今之动静，以隋为鉴，则存亡动乱可得而知。思所以危则安矣，思所以乱则治矣，思所以亡则存矣。”这篇奏疏简直是在讲反面教员的作用

和价值，包含了深刻的辩证法，后来被太宗抄贴于卧榻之旁，朝夕警惕。今存的魏征的奏疏，大都风格清峻遒劲，文字洗炼，推理谨严，读来气象森然，可谓文如其人。贞观十七年，他终以多病之躯，在竭忠尽智之后，先李世民而死。李世民非常悲痛，给他死后以极高的荣誉，让他陪葬昭陵，而且葬地在九嵎山上，离李世民的陵寝不远。这在李姓的王、公主以外，是唯一的一个。李绩、李靖，功劳都不比魏征小，也去陪葬，却在山下。魏征去世，太宗临朝叹道：“以铜为鉴，可正衣冠；以古为鉴，可知兴替；以人为鉴，可明得失。朕尝传此三鉴，内防己过。今魏征逝，一鉴亡矣。”这就是“人鉴”的由来。李世民重视“三鉴”，特别是“人鉴”，提出要“防过”。这是一般处于他这种地位的人很难有的自知之明。

“人鉴”的职责是“谏”，就是提意见，提批评。但“人鉴”之能否发挥作用，还要看临鉴者有无自知之明，有无李世民式的胸怀与器度。历朝都设谏官，如唐代的“左拾遗”之类，就是专职的“人鉴”。陈子昂、杜甫、白居易都作过这样的官。谏官品级不高，例如杜甫在凤翔行在就任左拾遗，级别是从六品下，只有芝麻、绿豆那么大一顶乌纱帽。但是危险极大，一旦搞得“龙颜不悦”，轻则打屁股、下狱、贬官、流放，重

则性命难保。至德二年，杜甫为疏救在陈陶斜打了败仗的宰相房琯，惹恼了肃宗李亨，要不是张镐出面说情，险些作了刀下之鬼。如果说杜甫的得罪，还可以说房琯确实打了败仗，为他辩护确有徇私情的嫌疑的话，那么韩愈的谏阻迎佛骨，总是光明磊落的了。然而，也惹恼了另一位皇帝。结果是“一封朝奏九重天，夕贬潮阳路八千”，凄凄惶惶离了长安，竟悲观到要他的侄儿韩湘子到瘴江边上去收他的老骨头。记得韩愈似乎并没有做过谏官，然而即使如此，上表言事，对臣下来说，也不算越俎代庖。他在《琴操》中说：“天王圣明兮，臣罪当诛”，不知是不是因为经过这一通变故之后学乖了。当然，多数皇帝也不是没有顾忌，杀谏官要留千古的骂名，所以不到万不得已，不到盛怒夺去理智的时候，一般都不出此下策，不玩真的。于是谏官们也就在这个夹缝中求得生存。可见，除非是作魏征那样的“人鉴”，碰到李世民那样的临鉴者，否则，“人鉴”本身并不会有坦途，更不要说安全。

铜可以为鉴，史可以为鉴，人也可以为鉴，那么，文可不可以为鉴呢？当然可以。事实上，人们历来就把文艺作为镜子看的。

文艺作品是现实生活的反映，要求真实，这一点象铜鉴，列宁称托尔斯泰为“俄国革命的镜子”，司汤